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

〔法〕高宣扬——著

KHA Sae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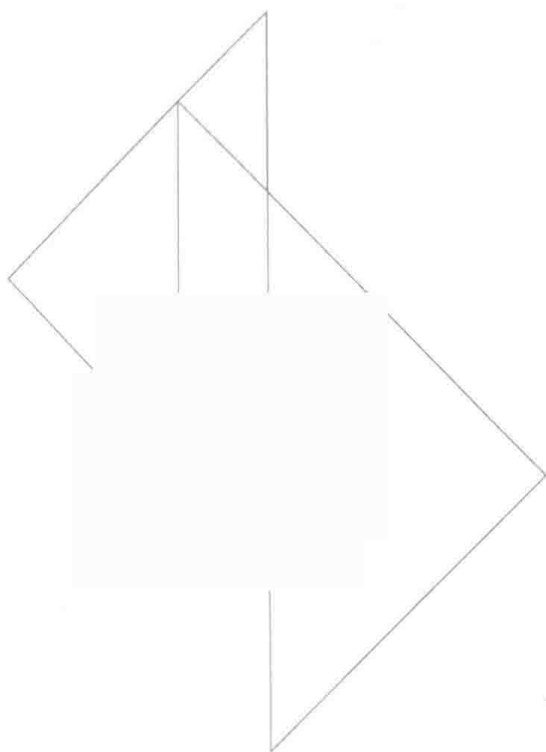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s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

〔法〕高宣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实用主义是兴起于 19 世纪末、盛行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主流哲学思想,其对于整个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全书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起源及流变,以及受实用主义影响的欧洲逻辑实证主义,介绍了实用主义创始人及代表人物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渊源及传承,以及在语言学领域的影响所形成的语用论思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 / (法) 高宣扬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高宣扬文集)

ISBN 978-7-313-18216-6

I. ①实… II. ①高… III. ①实用主义②语用学 IV. ①B087②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251 号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

著 者: [法] 高宣扬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425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3-18216-6/B

定 价: 9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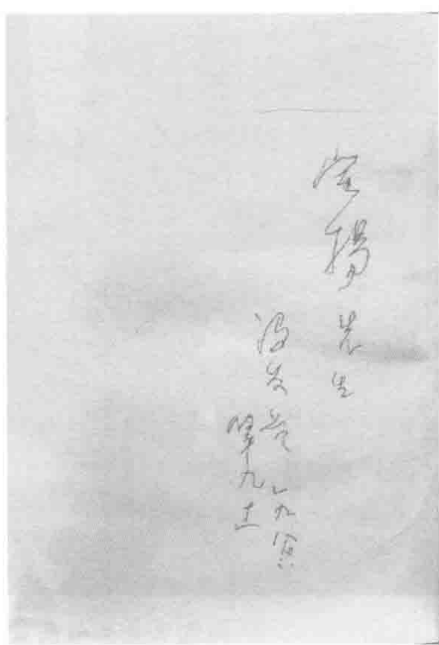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冯友兰先生与高宣扬教授合影,1990年



冯友兰先生赠予高宣扬教授的著作，并亲笔题字，1986 年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 New York, N.Y. 10027

DEPARTMENT OF GRADUATE STUDIES

Postage and Fees Pa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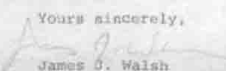
January 19, 1983

Dr. Saen Yang Kha
94 avenue du onze novembre
94170 Le Perreux
France

Dear Dr. Kha,

I have been given your request to visit this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of 1983. I have forwarded this request to Mr. John Graham of ou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with my nomination of you to Visiting Scholar status. This status permits you to attend classes and make use of the libraries. It may take a little time for response to my nomination, but you should eventually receive some indication from Mr. Graham.

Yours sincerely,


James G. Walsh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Acting Chairman

JJW: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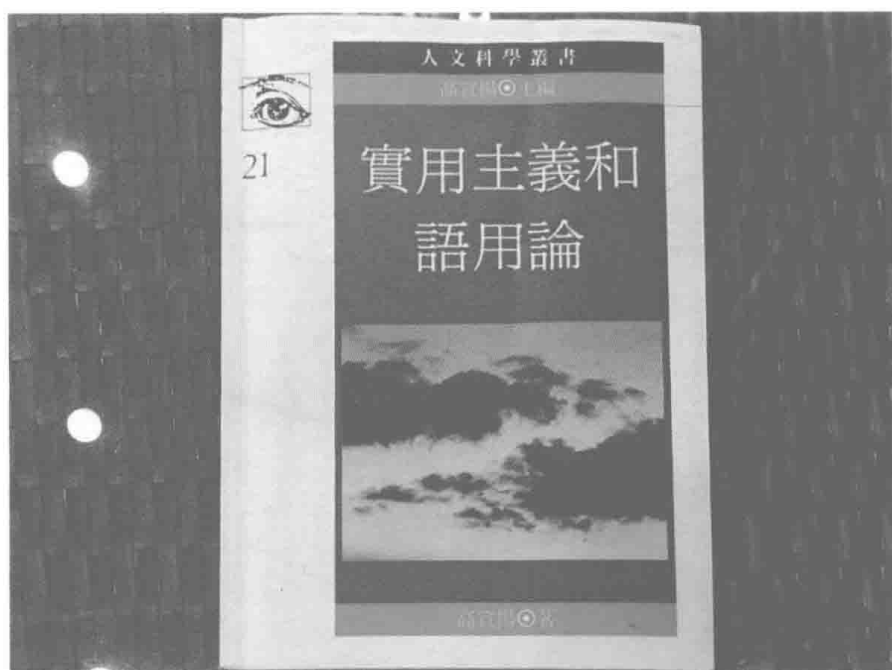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N.Y. 10027
DEPARTMENT OF GRADUATE STUDIES
POSTAGE AND FEES PAID

AIR MAIL



Dr. Saen Yang Kha
94 avenue du onze novembre
94170 Le Perreux
FRANCE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院院长给高宣扬教授的邀请函, 1983 年



《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 年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中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

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境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2017 年新版序

拙著《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初版于 1978 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时候,原名为《实用主义概论》,当时是应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李怡先生和陈松龄先生的邀约,请我担任《人文科学丛书》的主编,负责牵头组织出版一批较为通俗的哲学读物,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扩大作者队伍,组织海内外华人学者,有计划地撰写简述传播最广和影响最大的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书籍,分批分期地在香港出版。

天地图书公司在 1978 年请我主编《人文科学丛书》的想法,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文化状况,因为从 1949 年之后,中国大陆曾经连续不断地对西方思潮进行严厉的批判,而且,每当掀起特定的政治社会运动之时,更要求结合具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需要,配合运动中的不同政策,对不同的西方思潮进行特别的批判,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集中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思想的盲目崇拜,把胡适等人所宣传的实用主义作为批判的靶子,试图清洗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实用主义就成为 1949 年以后第一个受到全面批判的西方思潮。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当代西方一股重要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它在西方各国流传甚广、持续甚久,也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并能够长期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并非偶然,一方面是与实用主义本身的基本原则及其深远的思想理论根源有关,显示了实用主义本身隐含着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从20世纪初至今的社会文化状况有关,意味着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上述论断包含了一系列需要详细澄清和分析的复杂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首先弄清楚发生和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以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和西方人长期通行的日常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创造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它积淀了深厚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复杂历史传统,又表现了西方人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工业革命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基本心态,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文化新变革的特征。这些复杂的内容,凝聚在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中,也体现在实用主义的各个具体方法及其许多重要概念上。

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及其基本精神,固然表现在它的主要概念及其表述方式,但这些概念及其表述,不过是深入把握其核心和基本精神的“入门”。实用主义的真正内容、重要概念、原则和方法,既然隐含了西方社会文化长达两千年曲折发展的经验,同时又浓缩了西方人“为人处事”的智慧,因此就绝对不能靠表面背熟它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就可以完整地加以把握。

当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被传入中国时,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还没有充分具备足以完全消化实用主义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指:20世纪初,中国刚刚仓促完成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现代化进

程刚要起步,却远没有全面开始,国内也还没有实现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更谈不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入理解。

在最早向中国传播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只有像胡适(1891-1962)、冯友兰(1895-1990)等少数学者,由于他们原本已经受过长期扎实的中国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思想已有深刻的理解,又具有在欧美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直接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经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实用主义的精髓,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当时理解和接受实用主义只能停留在表面的水平上。

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于1919至1923年间曾经留学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以及新实在论代表人物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ames Eugene Woodbridge, 1867-1940)和蒙太古(William Pepperell Montague, 1873-1953),良好的学习研究条件使冯先生掌握了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核心观念。

根据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所说,杜威很关心他。当冯先生申请奖学金时,杜威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①。杜威对冯先生的赞赏,实际上也等于充分肯定了冯先生对实用主义要旨的透彻理解。

谈到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冯友兰先生指出:“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是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当时的新实在论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演讲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先生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②。

对于实用主义,冯先生说:“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

的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超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就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

冯先生接着指出:“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认为不仅真理是客观的,一切观念和概念也都有其客观的对象,这些对象都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但是从人的观点说,怎么样认识真理,那就得靠一种发现的方法。实用主义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所以,也有它的价值。总起来说,新实在论所讲的,是真理本身存在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讲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的问题。所以,两派是并行不悖的”^③。

1923年,冯友兰先生用英文写成名著《天人损益论》,作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博士论文。冯友兰先生指出:“人所经验的事物,不外天然的及人为的两类。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待于人,与天然的事物恰恰相反。实际的世界,有好亦有不好;实际的人生,有苦亦有乐。此为事实,无人不知。哲学史中大哲学家亦无不知。其所争辩,全在于对于此事实之解释及评论”^④。在答辩考试时,杜威先生向他提出问题:“这些派别是否有个发展的问题,例如这一派发展到那一派,而不是像一把扇子那样,平摆着?”^⑤。冯先生指出,他“没有打算讲某个哲学家、或某一个派别的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其历史背景,只把它们的思想的某一方面凸显出来。好像一个百花展览室所展出的花,不是某一棵花或某一棵树的全

面,而只是把某一朵花剪下来,作为标本,正是像一把扇子那样,排列在那里。当然排列是照着一定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所谓‘天、人、损、益’”。接着,冯先生进一步指出:“至于为什么某一个哲学家或某一个哲学派别主张‘天’和‘损’,而另一个哲学家或另一个哲学派别却主张‘人’和‘益’呢?我就归之于哲学家的‘气质’和他的在某一方面的‘真知灼见’。我引用荀子的说法,认为哲学家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我当时只是要证明,哲学家的派别,无分于东西,但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实际历史中,东方盛行‘天’和‘损益’,而在西方则盛行‘人’和‘益道’”^⑥。

这就表明,冯先生在美国接受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时候,一方面充分理解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应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观点和方法,在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的研究中,引申出自己的新结论,以实际行动把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原则和方法,灵活地同中国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超越他的老师们的理论。

冯先生在 1923 年回国以后,创造性地应用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又同时试图结合从 20 年代起传播于中国的唯物史观,先后对“人生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进行独到的研究^⑦,使他取得了不同于胡适的新成果^⑧。

陈寅恪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对冯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做的审查报告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⑨。对于《中国

哲学史》下册，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指出：“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是否有当，尚乞鉴定是幸！寅恪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⑩。

与陈寅恪一起审查冯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的金岳霖先生，也给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很高的评价。金先生认为，冯先生不同于胡适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成见他当然也是有的。据个人所知，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的哲学。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冯先生当然有主见，不然他可以不写这本书。他说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也可说是他的主见之一；但这种意见是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问题而不是一种哲学主张的问题。冯先生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⑪。

陈寅恪和金岳霖先生都很重视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观点和方法，并特别肯定冯先生在表达内容和意义方面的客观性以及冯先生在处理和分析材料时所使用的方法的严谨性。

实际上，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只是创造性地应用了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而且，还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他在《新原人》所主张的那种为人处事的“天地境界”。

冯先生说：“人在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见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这种精神世界，《新原人》称为‘境界’。各人的精神

境界,千差万别,但大致说,可以分成四种。一种叫自然境界,一种叫功利境界,一种叫道德境界,一种叫天地境界”^⑫。“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说明个人及其周围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都处理好了,那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新原人》认为,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⑬。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读书的时候,有幸连续多年聆听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并在一、二年级时,被班上同学们选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因而也成为班上同学与中国哲学史任课老师冯友兰先生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也是我的此生至幸。当时,我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几乎每周都要到冯先生燕南园的住处,一方面向他反映班上同学对他的课程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收集和整理同学们对课程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冯先生在下一堂课进行说明,同时也在必要时,请他当时的助手朱伯崑先生和卢育三先生针对问题进行特别的辅导;另一方面我还要在每周上课前,到冯友兰先生家里领取他亲自起草的《中国哲学史讲稿》,然后把冯先生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讲稿,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让其印成 80 份小册子,然后在每次上课前分别发给上课的每一位同学,让同学们都能够知道每堂课的基本内容。

如此来往于冯先生与班上同学之间,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冯先生,并与他的家人有更多的接触,这样频繁的接触让我感受到:冯先生及其家人,为人朴素厚实,谦和真诚而自信,真正体现出他们都在时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安身立命”于“天地境界”的最高目标,不愧是中国学人的典范。

20 世纪初期,深受西方帝国主义长期欺凌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光明前途,由一部分最有觉悟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具有责任与担当的优秀人才的引领,相当多的人都力图尽快地和高效率地把握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使之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但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思想文化基础薄弱,耐心深入研究工夫不足,都难免囫囵吞枣,也同样难免将实用主义误解和误传。问题还在于,对实用主义的部分误解和误传,往往又被当成“正确”或“真理”,以讹传讹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人心中竟逐渐形成了“信以为真”的奇怪状况。

其实,实用主义本身虽然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但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却深存于欧洲自古希腊经基督教并延伸至启蒙时代所累积的西方传统中。所以,要充分理解实用主义,不但必须尽可能精读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原著,细心消化实用主义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要深入了解产生实用主义的19世纪西方社会文化的具体条件,特别是当时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思想文化危机以及这场思想文化危机与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所遵循的创新方法的内在关系^⑭。

须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哲学和整个社会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迎来了哲学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创建了各有特色的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元化的理论体系,而在哲学上,主要是形成了一系列系统化的形而上学理论,它们各自声称是科学真理的理论化身,同时也把本来富有不断创新精神的理性怀疑的反思力量,凝固和窒息在体系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体系和逻辑格式框架中^⑮,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绝对观念论,就是这种体系化形而上学的典范。

这一切,恰好体现了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悖论性^⑯,它一方面宣告了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原则的胜利,另一方面又逐步暴露了现代理性的内在隐患,逐渐显示现代理性过分强调的系统性、普遍